

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

Huaxia Chuantong Zhengzhi Wenming



马平安 著

历览中国传统政治智慧

政治家与
古代国家治理

图文书局

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

政治家与 古代国家治理

马平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家与古代国家治理 / 马平安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126-6295-7

I. ①政… II. ①马… III. ①国家—行政管理—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1804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5mm×210mm 32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187千字

印 数: 5045

版 次: 2018年9月 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6295-7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序 言

“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很快就要出版了，团结出版社的同志要我在前面说上几句话。

这四本书分别是：《走向大一统》《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政治家与古代国家治理》以及《晚清政治地图——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和世界》。

四书的写作，既有个人文化使命担当的考量，也有新时代新气象召唤的使然。

一是梳理、总结中国政治智慧及政治文化资源的需要。中国是一个传统政治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度，上下五千年，政治智慧斑斓多彩。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国人去学习，去继承，去发展。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展现自己魅力的一份自信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一种动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自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特质。五千余年的历史长河，早已经铸就了极具东方特色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从五帝时代开始，经过历代大浪淘沙，不断积累，不仅成为中华民族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而且也成为世界政治文化的一

份独特因子。它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更是世界的。这笔财富必须继承，必须发展，更必须由人民大众来继承与发展，只有让人民大众皆知这笔财富之丰富、之重要、之价值，这笔财富才能够真正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它应有的、无可替代的巨大驱动作用。

二是新时代文化传播的形势发展和读者的学习需要。观现下图书市场，从通史角度对政治史概括和总结的书籍并不算多，尤其是尝试走出学术金字塔，力图从启蒙、普及、宣传、教化、通俗等角度尝试对五千余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进行梳理、分类、总结、扬弃，用大众学术精品思路铸就相关种类的书籍作品就更是寥寥。个人以为，学人的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让自己学术成果走向大众，承担移风易俗、化育人心的责任，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连中国古典文化、中国政治历史脉络大致是个怎样的状况，也因为研究者作品文字晦涩难懂而不能为大众所了解、所认可、所接受、所喜爱，不能由此登堂入室，学有所得，就不足以说明今日学术昌盛与文化发达。

三是源于本人的学术情怀及对大众学术门径的初步探索。古人治学，很注意在经济、义理、考据、辞章四个方向上同时着力，并不顾此失彼，相反倒是格局阔大，气象万千，文质彬彬，尽量在内容、意境、形式等方面追求尽善尽美，追求天人

合一，追求修齐治平。这种文以载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远大志向与目标，应该成为今日我辈努力的方向。大众学术作品就是在继承先人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面向大众，服务大众，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让人们发现历史的美、文化的美、知识的美。就大众学术作品而言，首先，它应该是学术实践和思想思考的产物，是学术力与思想力的有机统一，应该是真实、严肃，充满正能量，具有感染力的东西。其次，它的服务对象应该是人民大众。这就需要它的形式、文字等要生动活泼，内容、逻辑等要深入浅出，而不是语言诘屈聱牙，内容抽象艰深而令人难学难懂。

就四书而言，各书内容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彼此之间又具有严格的内在联系，是对华夏传统政治文明的一种鸟瞰式的观察与小结。

《走向大一统》主要是从制度史角度对华夏早期政治文明史所作的一种简单的概括与梳理。

中国是一个传统政治文明积淀深厚的国度。大一统构成了这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古老而常新的国度中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大格局和最鲜明的符号与特征。

从中国现代政治的结构要素来看，中国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模式与建构成分主要来自西方

所开启的现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现代政治是中国人自己建构起来的。尽管近代中国人在救亡形势下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力图超越中国传统政治的价值观念与制度系统，但其所立足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仍然还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社会的文化体系及其价值观念等等。由此导致的一个尴尬现象是，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现代政治不是西方的正统模式，因而将之打入另册；而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中国现代政治不是从中国文明中自生自长出来的，是学来的，很多人也对之采取不痛不痒的态度。这种情况，就使得中国现代政治缺乏有效的自我认同与国际认同，它无法明晰地告诉世人：它是什么？从何而来？为何如此？价值何在？存在理由何在？这是当前中国政治史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就中国现代政治建构而言，人们固然可以依据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变化来探索、来建构、来说明。然而，它却无法摆脱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社会与文化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族群存在方式及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于从西周开始具有三千多年大一统的传统而言，中国人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维系统一国家的行动与维系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中国，国家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结构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完善的一个和谐共生的过程，这使得中华民族大一统结构

成为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基础和内在要求。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大一统既是一种政治形态，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形态及其文化心理形态。正是这种综合意义上的大一统，使得中国文明与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发展至今，并且还会不断地更加完善和发展下去。

《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十二位思想家的主要思想进行简单的概括与介绍。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反映在《论语》《孔子家语》以及他所编定的“六艺”等书中。孔子的“仁”“礼”政治思想及其高尚人生追求，他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继承发展，他所提出的人生价值理念以及诸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等等，都对后世的中国人影响至深至远。

孔子的学生曾参曾作《大学》一文，主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提出人的修身实践路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今仍为人们所尊奉、所实践。

孔子的孙子子思则在其祖父学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庸”这条儒家最高的力行准则，要求人们注重“慎独”、立定“中”道，在好坏、快慢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折中，做到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不要不及。中庸之道就是要求人们遵守社会的既定秩序，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做越位非分的

事情。

像孔子一样，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十分热衷政治事业，以一肩担承道统自任。为了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孟子曾周游列国，到过魏、齐、滕、鲁等国，极力游说他的“王道”和“仁政”的政治主张，虽然整个过程极其艰难坎坷，没有诸侯愿意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但并没有击垮他的理想信念。孟子仕途不顺，最后退居讲学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他的思想，对后世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荀子是战国时期继孟子稍后的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以儒学为本，但并不以此为牢笼，而是博学广采，集诸子百家之所长，熔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为一炉，取儒法之精华，弃儒法之糟粕，别开天地，开后世历代君主专制治理理论之先河。他培养出像韩非与李斯这样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学生，一位成为中国早期法家的集大成者，另一位则成为大秦帝国制度的开创者。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经过两千余年世界文化长河的大浪淘沙，《道德经》已经被证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真正瑰宝之一，成为超越国界、人生修养必备的最重要的宝典之一。据有人统计，《道德经》在全球的销售量仅次于《圣经》，居第二位。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一样，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最精髓部分。

韩非是中国古代法术势思想的集大成者。人们公认，他吸收了公孙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同时又吸取了老子、荀子等人思想中的积极成分，经过个人熔铸和创新，使法、术、势三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法家完整的政治理论思想体系，其专著《韩非子》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帝王学的经典范本。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上承孔子，下肩朱熹，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承接作用。董仲舒以天为主导，以天人关系为轴心，以阴阳五行为材料，创造出的一套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融合了先秦诸子思想的天人感应说、三纲五常说，并将它成功实践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过他的大力提倡，儒家学说成为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学说也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干，从汉至清，一直在中国思想界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处于统治的地位。

朱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开山者。自元朝中期恢复科举制度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官方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朱熹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的地位正式确立，直到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朱子之学统治中国思想界、教育界长达八百余年。

王阳明是中国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山中贼”；一是“破心中贼”。前者是指他消弭民间动乱、维护明王朝统治秩序的事功；后者是指其建立心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成就。他以“辅君”“淑民”为目的，在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基础上，发展和奠定了中国心学的理论体系。他精通儒、道、佛等诸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更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他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等方面，皆有独到的建树。他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辟榛莽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杰出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有清一代朴学风气之先，是乾嘉汉学的“不祧之祖”。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念，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不息的精神力量。

黄宗羲则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提倡经世致用，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用心研究，在学术上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鸿篇巨制，皆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篇章。他的学说对曾国藩、毛泽东、蒋介石等皆有很大的影响。

《政治家与古代国家治理》是从管理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十大政治家的核心政治智慧以及主要政治治理成就等方面进行初步总结和探讨。

周公是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谈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礼乐文化，谈人文化成，谈儒家道统，都离不开周公。更为重要的是，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杰出的贡献。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文化上有大开拓。他尊重传统，注意以史为鉴。他所开创的以德治国的治理模式以及早期人文主义精神，对后世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政治治理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管仲是中国春秋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他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在经济上，农商并重，使齐国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中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在政治外交上，他采取以法治国与尊王攘夷的政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帮助齐桓公建立了春秋早期的霸业。无论是在维护华夏文化之统绪，还是在创造华夏文化之新质等方面，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商鞅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他以铁血手段与言必行、行必果的变法改革，开启了秦国统一天下大业的总枢纽。商鞅变法，无论对当时的秦国，还是对后世中国政治之变化，

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帝国政治以及他所创制的若干重要政治制度，特别是皇帝制度、郡县制度、官僚制度等，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了统一的高度集权的秦帝国，其执政的理论基础即是法家的以吏为师、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事皆决于法的基本思想，这为后世中国政治提供了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治理模式。

刘邦是汉帝国的创立者。他承袭了秦帝国的全部国家制度，并且根据汉初的实际情况采用了黄老治国之道，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理政策，这不但让汉政权顺利实现了“秦果汉收”，而且还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盛世——大汉盛世的到来。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北击匈奴，经营西域，设郡辽东，统一两粤、西南夷等地，使汉朝疆域版图超过了大秦帝国。更重要的是，汉武帝在治国理政诸多方面可谓开前人所未有。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学说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开创了中国思想界的大一统。在尊儒的同时，他又博采百家，重视法治。他的霸王道杂用之法，开创了后世统治者治术的百代之风。他所启动的古代丝绸之路，开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先河。

唐太宗是继汉武帝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他统治时期，将三省六部制度高度完善，诸项治理措施得当而效果明显，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政绩可圈可点，他一手启动了大唐盛世。

宋太祖以文抑武，实行文官治国，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宋太祖的文治思想，其基本内涵就是将科举取士与文官政治相结合。他确立殿试制度，培养天子门生，压抑世家大族，改变武人政治，士大夫从此成为赵宋王朝统治大厦的基石与支柱。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构成赵宋王朝统治的主要特色，对后世中国的官僚政治影响很大。

张居正执政期间，面对明王朝出现的财政困难、政治腐败、边防松弛等状况，以其缜密而又远见卓识的谋略和果敢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通过他的强有力的改革，暂时解决了明王朝积重难返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就那个时代看，是非常成功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他在位六十年，文治武功兼备。文治方面，他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惩治贪污，以儒家思想治国；武功方面，他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消灭噶尔丹反叛势力，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将沙俄侵略势力赶出东北地区、实现中俄东端划界。他的业绩，为清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清政治地图——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和世界》则是从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角度将中国置于世界变化发展的视野中来综合考察晚清政府的施政得失。

从秦始皇开创中华帝制，到十九世纪中期清王朝的统治出现严重危机，经过两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侵蚀与打击，帝制这种政治运作模式已经存在太多的问题。不仅如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传统中国政治正在寻求转型之际，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在坚船利炮开道下，他们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中国。在民族、国家前途出现重大生存危机的情况下，运用传统帝国制度的清政府又不能及时调整转型，对内不能革新，对外不能开放。最终，因为制度的缺陷与治理的不力，国人将全部过失清算在了帝制代表者的清政府身上，中华帝国制度也就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总结起来，清王朝统治之溃堤，从其内部来看，决非是一日之失。

清政府在1840年直至1912年在国策上所犯的错误主要有：

第一，昧于对世界大势的了解与掌握。自乾隆晚年起，面对西方国家一次又一次在政治、经济、外交上不断采取行动、意欲与中国进行沟通的现实，清政府抱着传统的夷夏观念不放，对世界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统治者不去积极了解世界已

经变化了的形势，继续固步自封，结果一再丧失调整与发展自己的宝贵时机。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观念落后，必然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第二，缺乏自强自立的决心与恒心。面对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清政府没有自强自立的一个长期决心，不去积极建设国防现代化、逐步改良政治、发展经济与文化，对外政策也只是以抚为主，以和为贵。真正认清世界形势的只有曾国藩、李鸿章等少数有眼光的地方督抚。他们虽然也发起过洋务自强运动，但由于不是中央政府的自发自强行为，其结果自然也就可想而知。晚清七十年，清政府的国防现代化始终没有真正启动起来。

第三，吏治腐败，权力基础癌变。晚清官场腐败黑暗，官吏做官的目的大多是求名求利，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将国家振兴、百姓安足的事情放在心上。官员们只知贪财索贿，取宠保荣，维护国家基础的权力场已经彻底发生了病变。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束手无策，最终官逼民反，致使统治者最终丧失了先辈们通过努力好不容易才在国民心目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第四，高层统治阶层争斗不停，严重削弱了自己统治的基础，最终引发了统治危机。从道光开始直到宣统时期，统治集团内部高层争斗不断。决策层不是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而是权

力倾轧、利益集团崛起，这必然会引发统治混乱，从而给野心家们乱国乱政提供机会。

第五，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保持的是内轻外重的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地方督抚逐渐侵夺了原本属于中央政府的诸多军政大权，尤其是经过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袁世凯集团接力棒式的侵夺、腐蚀，清政府赖以维护统治的暴力工具如军队与警察最终为地方督抚及其他异己的利益集团所控制，这是引发清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利益集团的政治鼓荡。在改革过程中，清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倒培养出了三个异己的利益集团。它们一个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国内立宪派集团。这个集团以新生的商人阶层与士大夫精英阶层为核心力量。另一个则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事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以官僚阶层与军人阶层为根本。第三个是以留学生为首的各省新军团体。正是这三个利益集团不断的政治诉求与政治鼓荡，耗尽了大清帝国最后一点生存能量。因为对在清末新政过程中这三个新生的利益集团处置不力，最终导致三者在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合流，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机与革命党人联手推翻了清政府。

第七，最高统治者缺乏调整政策实现政治转型的应变能力。面对政治改革与对外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压力，清政